

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探析

岳汉景

内容提要 伊朗核计划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自始就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70 年代前、中期，伊朗核计划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呵护”，因此，没有成“问题”。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同美国及以色列等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伊朗核计划逐渐向“问题”方向发展。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一超”独大。90 年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总体是防范、遏制非敌、非友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等等。乔治·沃克·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受到九一一事件的影响，变得更具进攻性，将追求“绝对安全”突出到战略高度。在措施上，布什公开把伊朗等国作为重要“关注国”。近年来，伊朗核计划快速推进，随之伊朗“核问题”亦逐步“危机”化。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表明，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关键词 伊朗 核问题 美国 安全战略 关系 条约

作者简介 岳汉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问题研究所博士生（上海 200083）。

长期以来，伊朗核问题¹或明或暗、时隐时现，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渐升级，日益向危机^④方向发展，并几度濒于危机的边缘，成为倍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瞩目的热点问题，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除屈指可数的核大国外，世界上有核计划、进行核活动的国家很多，^④有的还有了核武器，比如印度、巴基斯坦，甚至以色列，但它们的核计划基本上没有成为“问题”。伊朗的核计划为何升温为“问题”，其本质是什么？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

由“计划”到“问题”

伊朗核计划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自始就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1957 年，伊朗同美国签署了一个民用核合作协议，作为美国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一部分。^{1/4}1970 年伊朗正式批准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2}但伊朗国王还有获得核武器的目的。“1974 年，伊朗国王

¹ 本文的“问题”是指在较长时间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大政治力量参与斡旋和解决的重大政治事件。

^④ 在国际政治中，“危机”可以是“问题”，但它是具有决断上的紧迫性和态势上的军事对抗性“问题”，因此“问题”不一定是“危机”。据此，笔者认为，用“伊朗核问题”来概括事实较之用“伊朗核危机”更为贴切。See Michael Brecher & Jonathan Wilkenfeld, *A Study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 3

^④ 目前至少有 44 个国家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See Frode Ringdal & Brian L N Kennett, *Monitoring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 – Test – Ban Treaty: Source Location*, Birkhauser, 2001, p. 2

^{1/4} Geoffrey Kemp, “Iran: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 a Deal?”,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4. No. 1, Winter 2001, p. 124

^{1/2} Nathan E Busch, *No end in Sight: the Continuing Menace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University Presse of Kentucky, 2004, p. 264

设立了伊朗原子能组织，并声称，毫无疑问伊朗将很快拥有核武器。”^①这一时期，由于伊美两国关系融洽，加之“巴列维政权意在威慑地区强权，如埃及、伊拉克”^②。伊朗的核计划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呵护”^③，因此根本就不成“问题”。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同美国及其盟国以色列等国的关系急转直下，降至“冰点”，伊朗的核计划开始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严重关切，逐渐向“问题”方向转化。但这种由“计划”向“问题”的转化是相对漫长的。这是因为此时期对美国来说使伊朗核计划演变成“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均不明显。从必要性方面看，伊朗核计划的进展因霍梅尼对核武器的消极态度^④以及两伊战争的破坏^⑤等而极为缓慢。从可能性方面看，美国无暇、也无力把阻遏伊朗核计划的方式由单方面且经常是秘密行动扩大为广泛而公开的全球行动：这一时期，美国的安全战略仍是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遏制战略”和核威慑战略，自身对核军备竞赛“情有独钟”，且在国际范围内具有两极对峙背景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因此，这一时期“问题”难以形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两极格局土崩瓦解，国际政治地图重绘，美国“一超”独大。美国认为，像苏联那样“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至少在20年内不会出现，美国因此能够有一段宝贵的“战略间歇期”，美国应该抓住机遇、创造机会，稳固它对世界的主导地位。但同时美国又认为，新的安全挑战在涌现，国际安全环境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新的安全挑战，包括地区性危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相关技术扩散的威胁、各种跨国威胁和恐怖主义等威胁。据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尽管其目标的轻重缓急并不很明确，但总体是防范、遏制非敌、非友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对付地区性威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相关技术扩散，反恐，以及推广其民主价值观。^⑥

在这种国家安全战略主导下，国际核裁军在20世纪90年代初呈现一派喜人景象^⑦。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之间的公平性有所平衡。同时，在这一国家安全战略主导下，美国对其眼中的伊拉克、朝鲜、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朗等所谓“独裁”、“无赖”国家极不信任、极度仇视，千方百计地施以制裁、打压，特别是对它们的核活动更是极力关注。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沸沸扬扬、旷日持久但却无果而终的伊拉克“武器核查”；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一波三折但至今仍处于胶着状态的“朝核问题”也渐入人们的视野。

与此同时，伊朗核问题也渐露端倪。伊美关系，在冷战结束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同时也恰巧是后霍梅尼（1989年逝世）时代，并没有迎来“春暖花开”的新景象，而依然冰冻如故。克林顿时期的“双重遏制政策”和美国国会为强化对伊朗制裁而通过的“达马托法”，几乎使美伊敌对关系制度化、长期化。美国一直指责伊朗与恐怖分子有牵连，对伊朗的核计划颇为敏感，认为其民用核计划无非是为转为军用制造核武器作积累、打掩护而已，明里暗里都竭尽全力地施压作梗。1992年2月，伊朗已经准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的所有核设施。^⑧

20世纪90年代伊朗因霍梅尼辞世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善了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伊朗核计划的合

^① Jacqueline Simon, "United State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and Iran: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17, No. 3, December 1996, p. 371.

^② David Albright, "An Iranian 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1, No. 4, July/August 1995, p. 26.

^③ See Jacqueline Simon, *op. cit.*, pp. 365-394; Gerardi and Maryam Aharinejad, "Report: An Assessment of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2, No. 3, Spring/Summer 1995, pp. 207-213.

^④ Greg J. Gerardi and Maryam Aharinejad, *op. cit.*, p. 208.

^⑤ Gawdat Bahgat, "Iranian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Trans-Atlantic Division", *Section Hall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mmer/Fall 2004, p. 144.

^⑥ 参见赵怀普：《试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4期，第28页；潘忠岐：《利益与价值观的权衡——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与调整》，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40页。

^⑦ 参见《世界知识》，2003年第22期，第19页。

^⑧ See Michael Z. Wise, "Atomic Team Reports on Iran Prob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5, 1992, pp. A29-A30.

作对象重点是俄罗斯等国家, 伊朗与有关国家签订了一些协议。90 年代初, 伊朗与俄罗斯签订了一项政府间协议, 俄罗斯承诺向伊朗提供核能源方面的援助。“1995 年 1 月初, 伊俄签署了一个 8 亿美元的合同, 以期完成位于布什尔的两个核装置中的第一个。”¹ 美国对俄伊两国进行原子能方面的合作一直持批评态度, 俄伊核能合作的问题从此也成了俄美两国领导人的重点话题, “在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阻止俄罗斯帮助伊朗的核计划是美国的一个首要任务”^④。

可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由于国际格局剧变, 美国相对优势增强, 它已经完全有能力操控国际机构、利用有关政治势力、对有关国家施压, 而使伊朗的核计划成为“问题”。而由美国安全战略所决定的美伊敌对关系又加速了伊朗核计划向“问题”的转化。这一时期, 由于伊朗核计划直接诱发了世界多个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角力斗争而初具“问题”雏形。

“问题”“危机”化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美国因其科技进步、经济持续发展而在综合国力上更加领先于其他大国, 其“一超”优势加强, 因而追求绝对安全、巩固独霸地位的心态时有展露。1999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名为防御 (声称防御朝鲜、伊朗等国)、实为更好地进攻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 法案。同年, 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以确保美国核武器技术领先于他国。乔治·沃克·布什政府上台后,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受到九一一事件的影响而变得更具进攻性, 美国首次将追求“绝对安全”突出到战略高度, 宣布进行导弹防御系统实验, 单方面退出了一度被认为是国际战略稳定之基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并把反扩散、反恐、打击“失败国家”、“无赖国家”作为第一要务。与“绝对安全”战略相辅相成的是“先发制人”战略, 打击的重点是恐怖分子, 以及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 藉此威慑、遏制潜在竞争对手。

在安全战略的措施上, 布什总统于 2002 年公开把伊拉克、伊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 作为重要“关注国”。早在 2001 年美国就特别指责伊朗支持、从事恐怖活动, 藏匿恐怖分子和推进核武器计划^(四)。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 美国把伊拉克、朝鲜、伊朗、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中国列为核打击的 7 个目标国, 提出美国可能恢复核试验及研发各种小型核武器, 并将在多种条件下可能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在行动上, 美国以反恐、反扩散、反独裁为借口, 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以武力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美国这种咄咄逼人的政策、言行产生了较大的威慑作用, 这种威慑在反扩散上产生了双向效应: 一种是古巴于 2002 年 11 月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⁵ 和利比亚主动放弃核武器的研发; 另一种是朝鲜于 2003 年 1 月 10 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⁶ 伊朗也加紧其核工程项目建设, 并取得一定成就。正如一家西方媒体所指出的: “批评布什政府的人说, 布什反对‘邪恶轴心’的强硬路线连同具有恐吓性的伊拉克战争, 已经成为伊朗和朝鲜加速其核计划的刺激物。一位熟悉两国事务的西方外交官说, ‘如果说这些国家以前没有多少刺激和动机的话, 那么在布什的邪恶轴心论以后它们肯定有了’。”⁷

近年来, 伊朗实施核计划的速度加快, 核潜力也相当可观, 核电站前景看好。自制导弹能力的加

¹ Gawdat Bahgat, op. cit., p. 144

^④ Robert J. Einhorn, “A Transatlantic Strategy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4, p. 21

^(四) “Iranian progress toward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http://www.milnet.com/Iranian-Nuclear-Chronology.htm>.

⁵ See “Cuba Accedes to NPT, Joins Tlatelolco”, *Arms Control Today*, December 2002, p. 26.

⁶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 90.

⁷ Massimo Calabresi, “Iran’s Nuclear Threat”,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430649,00.html>

强，尤其是中远程导弹的生产扩大了伊朗抗美能力。¹ 对伊朗的核活动时时刻小心翼翼的美国，对这种情况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伊朗快速推进核计划之时，也是伊朗核问题升温、升级之时。

早在 1997 年，美国情报部门就确信伊朗在从事核生化武器研制活动，对此，伊朗矢口否认。2002 年 8 月，伊朗的一个反对派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首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披露，伊朗在纳坦兹 (Natanz) 和阿拉克 (Arak) 正在建造两个秘密的核场地。2002 年 9 月 16 日，美国商用卫星拍摄到一组照片，经专家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消息。这组照片于 2002 年 12 月 12 日对外公布，令世界瞩目。伊朗核问题骤然升温。2003 年初，伊朗总统哈塔米承认，伊朗发现并提炼出能为其核电站提供燃料的铀，这说明伊朗具备铀浓缩生产技术。美国政府警告伊朗停止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并威胁要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以对伊朗进行制裁。此后，伊朗核问题一波三折，扣人心弦。2003~2005 年，参与的主角是欧盟三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隐身台后。其间，在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压力下，2003 年末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4 年底与英、法、德达成了《巴黎协议》，2005 年 8 月出台了英、法、德提议。但这些都未能阻止或利诱住伊朗，没能使其一劳永逸地停止浓缩铀活动。在核问题有被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的危险时，俄罗斯于 2005 年底提出将铀浓缩的后续活动转移到俄罗斯境内的建议，后来又提出在俄罗斯境内建立浓缩铀联合企业，以确保伊朗核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目的。自此俄罗斯强势介入。但伊朗对俄罗斯的建议一边闪烁其词、不置可否，一边态度坚决，表示伊朗要继续铀浓缩活动，并于今年 1 月 10 日正式启封其核燃料研究设施。2 月初国际原子能机构表决通过将伊朗核问题向安理会报告，整个国际社会都参与其中，伊朗核问题步步升级。^④ 安理会经过几周紧张激烈的磋商，最终于 3 月 29 日一致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把处理伊朗核问题的任务重又交给了国际原子能机构，限其总干事在 30 天内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安理会报告“问题”的新进展。

伊朗核问题从 2003 年由英、法、德和国际原子机构斡旋，至 2005 年底俄罗斯高调介入，再到目前的安理会讨论，已进入国际大小政治力量磨合较劲的阶段，美国借助国际机构和政治势力的程序化回旋余地已不多，面临走出前台、亲自出马决断摊牌的复杂局面，“危机”形势已依稀可见。但辩证地看，“危机”两字是“危险”和“转机”的统一，世人期待着转机。

“问题”的本质

探究事物的本质，寻求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应从分析事物内部的各种矛盾入手。事物的发展过程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事物内部的矛盾状况。从上述伊朗核问题的演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问题”内部的各种矛盾：美伊矛盾、伊朗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矛盾，或者说伊朗同国际秩序、国际社会的矛盾、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矛盾、伊朗与英、法、德三国的矛盾、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矛盾，等等。

然而矛盾分析法要求我们要坚持“重点论”，要在各种矛盾中分析、鉴别出主要矛盾，因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④。在上述与伊朗核问题相关的矛盾中，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矛盾，以及伊朗同英、法、德三国的矛盾都是伊朗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矛盾的产物，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监督执行机构，英、法、德则极力促使伊朗遵守该条约及

¹ See “Iranian Progress Toward Developing Weapons”, <http://www.milnet.com/Iranian-Nuclear-Chronology.htm>

^④ See Robert J. Einhorn, “A Transatlantic Strategy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4; “Iran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Iran_and_weapons_of_mass_destruction; 参见陈一鸣：《伊朗核问题大事记》，载《人民日报》，2006 年 1 月 11 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0 页。

其附加议定书。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矛盾主要表现于如何履行该条约，以及“问题”的解决方式上（中国、俄罗斯认为伊朗有权和平利用核能，主张充分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反对经济制裁或军事手段；而美国则态度强硬，不希望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的核活动，坚决反对伊朗进行与核武器有关的活动，并多次威胁实施经济制裁，甚至动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因此它们是美伊矛盾的产物。总之，从强度和重要性看，伊朗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矛盾和美国同伊朗的矛盾是相对突出的矛盾。而这两者之中，哪个是决定伊朗核问题产生与发展的最主要矛盾呢？

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认为伊朗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矛盾是“问题”的本质，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西方学者，例如哈佛大学的杰弗里·刘易斯也认为“问题”的实质是伊朗的违约不轨。¹但这显然是避实就虚、自欺欺人。从上述伊朗核问题的演进中可知，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核计划已有长足进展，而且此时它已经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字国，伊朗国王却公开其获得核武器的意图。因此伊朗在这一时期显然是违反这一条约^④的。但伊朗的核计划却没有成为“问题”。80年代末至90年代，伊朗试图重启核计划，在此条约规定的权限内和平利用核能，但却屡遭美国的打压、堵截，伊朗核计划逐渐成为了“问题”。显然这一时期违反此条约的不是伊朗，而是美国，因为美国试图剥夺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努力制止伊朗进行任何核活动。最近几年伊朗或有违反这一条约的行为，^⑤伊朗的核计划更成为热点问题。见下表：

时 间	伊朗是否违反此条约	核计划是否是“问题”	美伊关系状况
20世纪60~70年代	违 反	没有成为“问题”	友 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没有违反	逐渐成为“问题”	敌 对
21世纪初	违 反	“问题”“危机”化	敌 对

根据上表，伊朗核计划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可以不成为问题（20世纪70年代），也可以成为问题（21世纪初），这表明核计划违反此条约并不是它成为“问题”的充分条件；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伊朗的核计划没有违反此条约却逐渐地成了“问题”，这又表明核计划违反此条约不是其成为“问题”的必要条件。因此伊朗核计划违反此条约既非“问题”形成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显然不是伊朗同此条约的矛盾。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有一个被排除了，故推理的结果是：美伊矛盾是最主要矛盾。因此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伊矛盾。由于核问题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因此又可以更具体地说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伊国家安全战略的矛盾。依据上表，当美伊关系友好时，伊朗核计划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却没有成为“问题”，而当美伊关系敌对时，无论伊朗是否违反此条约，伊朗的核计划都成了“问题”。因此，利用归纳法也同样可以得出“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伊矛盾”这一结论来。而且在本质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结构，英、法、德，甚至联合国都无非是美国限制、打压伊朗的工具。这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美国可以全部抛开它们，伊拉克战争已证明这一点。而这也正是“问题”的严峻性所在。这再次说明了“问题”的本质是美伊敌对关系。

“重点论”不但要求我们找出主要矛盾，还要求我们找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⑥在美伊国家安全战略的矛盾中，显而易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矛

¹ See Jeffrey Lewis, “Nonproliferation and Nuclear Standoffs”, *Ask This*, February 13, 2006.
^④ 此条约的核心是：不扩散（不传播、不生产）、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See “Nuclear Non- Proliferation Trea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Non- Proliferation_Treaty.
^⑤ 主要表现为伊朗没有认真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不够“全面、及时、主动”。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把核活动用于军事目的。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盾的主要方面。因为美国较之于伊朗，美国国力强大得多，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其基于国际格局和新的安全威胁比如恐怖主义等而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宏观看，对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从微观看，对美伊关系状况起支配作用。从上文对“问题”演进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加剧了美伊安全矛盾和相互的猜疑与敌视。伊朗前总统哈塔米以改革者形象上台后，美国本来有一个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使美国坐失了良机。

通过对伊朗核问题所蕴含的主要矛盾和其主要方面的分析、论证，可以更准确地说，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结 语

从世界范围内也同样可以看出伊朗核问题的本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违反者首推美国¹，这已为世界所公认，但美国的违约从未成为“问题”。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已是公开的秘密，但美国默认之，根本没有使其成为“问题”，非但如此，它还不无偏袒地反对一些国家提出的中东地区全面无核化的倡议。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经拥有核武器，美国虽然事后连同他国对印、巴实施过制裁，掀起了一点风波，但却波澜不惊，如今早已风平浪静。非但如此，美国和印度新近还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伯尔顿日前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印、巴是合法拥有核武器，因为它们不是“条约”的缔约国。这话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们拒不签约本身正是对“条约”，乃至对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重大挑战。美国却没有尽其所能，迫使它们加入。而对伊朗，美国却千方百计直接或间接地迫使它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而且目前还在想方设法地使朝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是一位西方学者说出了真正的原委：“现在我们讨好印度，并与之签署了核合作附加协议，因为如果我们‘关心’中国时，就会需要印度的友谊。巴基斯坦穆沙拉夫将军的友好行动，在我们打击塔利班的斗争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至少现在如此。”^④另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对（美国）政府的激进要员如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反扩散官员罗伯特·约瑟夫（Robert Joseph）副国务卿道格拉斯·非斯（Douglas Feith）、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以及副国防部长首席代表斯蒂芬·坎博恩（Stephen Cambone）来说，核武器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坏家伙弄到手就是问题了。”^⑤而“朋友”、“坏家伙”正是由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决定的。综上可以发现伊朗核问题的演进轨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敌、友、非敌、非友——核武器上的双重或多重标准——伊朗核问题的产生。正如我国军控专家顾国良所言：“美国对各个国家在核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均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考虑，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反映。”^¼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在核问题上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清楚地表明，伊朗核问题的本质不是伊朗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矛盾，而是美伊矛盾，是它们的敌对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一点已为本文关于伊朗核问题产生、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所昭示。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参见樊吉社：《核不扩散体系的尴尬》，载《人民日报》，2006年3月16日。

^④ Kam Zarabi, “Iran Looming Larger in the Crosshairs”, <http://www.payvand.com/news/06/mar/1083.html>.

^⑤ George Perkovich, “Bush’s Nuclear Revolution: A Regime Change in Nonprolifera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3.

^¼ 《世界知识》，2003年第23期，第26页。

Passing on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and Developing the Bright Prospect

Yang Fuchang

pp. 9– 13

When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ian countries this year, we have experienced three high tides in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in the past fifty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ian countries may imply some poi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s a gradual process; China's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

promoted this process; the adjustment of the U. S. policy to China affected some Arabian countries' approach to China; China and Arab support each other to make their relations progress constantly. In the 21st century, on the comprehensive and solid basis, Sino-Arab relations will mak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the prospect is bright.

A Study of the Nature of Iran Nuclear Issue

Yue Hanjing

pp. 18– 23

Iran's nuclear plan started from 1950's, under the help of the U. 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t its birth. Since the victory of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in 1979, Iran's nuclear plan has been showing the tendency of being an issue,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U. S. as well as Israel chilled.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e U. S. began to pursue a national strategic aim of guarding against and containing the potential strategic rival. After Sept. 11st At-

tacks, U. S. Put "absolute security" in a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Iran became one of the "concerned countries" of the U. S. With Iran's nuclear plan progress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nuclear issue is getting to be some crisis. The dual and multi-criteria of the U. S. on nuclear issues show that the nature of Iran's nuclear issu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 S. – Libya Relations: Reasons from Hostility to Friendship

He Wenping

pp. 24– 29

On 15th May 2006, the U. S. made the announcement of fully restoring the diplomatic ties with Libya. The reasons from U. S. are that it hopes Libya can set an example for those "rogue states", further control Libya and the other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nd build a global anti-terror strategic bases chain. For Libya, it also hopes to impro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the U. S., help it get

more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get rid of the long time diplomatic isolation and upgrade Libya's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strengthen and speed up the political-economic reform in Libya, and provide impetu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il industry. Owing to the decades-long hostility, it is not easy to be diselled in a short time.